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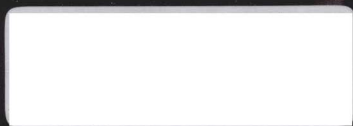


北京电影学院
电影艺术理论研究丛书

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

从电影认识上海
本土都市认同的形成 1937—1945

林黎 著



HEAVEN BUILT UPON HELL

—Finding the Formation of Local Urban Identity in Shanghai
Through Movies From 1937 to 1945

C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电影学院
电影艺术理论研究丛书

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

从电影认识上海
本土都市认同的形成 1937—1945

林黎 著



HEAVEN BUILT UPON HELL

—Finding the Formation of Local Urban Identity in Shanghai
Through Movies From 1937 to 1945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从电影认识上海本土都市认同的形成：1937~1945 / 林黎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

ISBN 978 - 7 - 106 - 04166 - 3

I. ①建… II. ①林… III. ①电影史—研究—上海市—1937~1945 IV. ①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5681 号

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

——从电影认识上海本土都市认同的形成 1937—1945

林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m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7.25 插页/2 字数/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4166 - 3/J · 1681

定 价 48.00 元

抗战八年的上海,先是成了被沦陷区包围的“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更直接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魔爪。这是上海历史上一段耻辱的经历。然而对于这段时间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来说,这里又是战乱中难得的避难之所。人们珍惜这份宁静,用歌舞升平来守护这份宁静,创造了战时上海一段奇妙的繁荣。正像本书的书名所说的那样,这里是“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

电影作为最重要的大众文化媒介之一,既反映又参与造就着这种“地狱”中的天堂梦。这一时期的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研究难度较大的一个领域。这既是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更由于资料的缺乏和缺少印证。

对于许多当时的中国亲历者来说,这一时期虽然可能有着片刻的宁静,但大多仍是痛苦和屈辱。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对这段时间的经历大都讳莫如深,很少提及。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各种社会和政治原因,人们把这段历史排除在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视野之外。这些都使得本来就比较缺乏的影像和文字资料进一步散失严重或难以面世。

认为应当对战时上海电影进行重新评价和认识研究的呼声早已出现。早在1983年举办的“20—40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海分会场的放映研讨会上,从对影片《红楼梦》的讨论开始就涉及了对沦陷区上海电影再认识的要求。但是相当长的时间里系统研究仍然缺乏,在中国方面史料十分缺乏、口述历史和回忆资料基本阙如的情况下,作为占领者的日本人则在战后出版了不少回忆录和相关资料。这为了解战时上海的电影运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阐述。过久一、川喜多长政、李香兰等人的回忆成了研究战时上海电影的最重要史料来源。然而这种史料的缺乏和来源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思路的开拓。直到近年来,傅葆石等学者从更宏观的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切入观照战时上海电影,引入更多的社会历史资料,帮助建立起更加深入的关照和印证,才有力地推动了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也为电影史研究思路的开拓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这本《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从电影认识上海本土都市认同的形成1937—1945》是林黎基于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的。它不仅仅是对战时上海电影现象本身的研究,同时也着眼于上海都市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探讨了电影与都市文化之间的互动。其思路无疑受到了傅葆石等前辈学者的启示,但其引进了大量对于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移民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资料

从电影认识上海本土都市认同的形成1937—1945
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

与研究成果,结合电影产业和创作对人们的都市认同心态折射与造就的互动进行了有意义的观察。

以往说到上海的都市发展,首先让人想到的是1927—1937年的所谓“黄金十年”。这时的上海发挥出其租界文化的开放性优势,海纳百川,吸引来全国各地的移民,传播着世界各种声音,创造着上海的都市繁荣。人们常常把这当作上海文化的基本特征,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很少看到这时的新移民自称“上海人”,他们到上海是来“闯世界”的。上海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这不仅由于其有“极左”时代所鄙斥的投机性,还带有着崇尚探索精神和勇气的积极内涵。而战争让上海从“滩”变成了“岛”,其文化意义和居住其中的人们的文化心态也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本书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从多种角度尝试对成为“孤岛”后的上海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的变化做出描述。日本侵略者作为占领者,他们既希望上海维持繁荣,以使自己有较好的国际形象,但作为占领者又不能让上海成为过去那样充满活力和勇气的城市,因为对探索和勇气的鼓励将是对暴力统治的一种潜在威胁。日本侵略者其实是期望和鼓励上海从生存状态到文化心态的“孤岛化”的。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其利用较少的资源有效地管理这个被占领的大城市并维持其至少表面上的繁荣,而造就一种自认为比流离颠沛与战乱中的外地人更幸运的“岛民化”文化心态,也成为日本统治者的一种文化统治策略。而对于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人,这种自我认同的过程又成为其情感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从“到上海来闯世界的人”到“上海人”的认同背后,其实是在偷换上海的都市精神。表面上维持上海滩的繁荣假象,实际上努力通过“岛民化”来消解中国人的反抗精神。这是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文化策略。

在这样的都市认同和文化心态建构的基础上认识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上海电影,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有意义的启示。日本统治者的文化策略和中国电影人的民族认同与生存智慧进行着微妙的互动和博弈,形成了有趣的文化景观。

战时上海中日双方的一些主要电影人物如张善琨、刘呐鸥、川喜多长政、李香兰等人都是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他们即作为有个性的个人活跃在战时影坛,又根据各自的社会身份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往日本方面的回忆录,大多强调他们个人对中国的情感,而有意无意地回避其作为社会角色的存在。但本书将这些人与事放在日本对于被占领的上海的独特文化期待和控制策略的背景下进行描述与分析时,就会发现他们实现其社会角色的独特方式。如川喜多长政对中国影人的“友善与救助”,李香兰对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非刻意隐瞒”等也都不再难以解释了。

当然,这是一本用历史学方法对电影进行文化史研究的著作。其对当时的电影产业和状况的梳理与描述也有一定的独到之处。战时上海电影的影片资料存留和开放的非常少,直接文字资料也十分有限。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面貌和梳理历史线索也是对研究能力的一种考验。本书将产业运作和创作作为一个互动的整体加以考察,这对于我们理解作品和艺术与文化现象是有所裨益的,例如书中对于张善琨在“孤岛”时期对新华公司的产业运作,对《万世流芳》等影片和“李香兰现象”等的分析描述,通过对其他经济现象的观察的引入,通过对于流行音乐等相关文化资料的发掘,使我们对当时的历史面貌有了更直观的印象和更清晰的认识。

我愿意推荐这部著作,不仅因为作者是我的学生,而恰恰是因为这本书有些不同于其他电影专业的研究。作者努力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把艺术分析落到实处,她选择了一个研究难度较大的课题,虽然做得还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这种努力和探索是有价值的。预祝她在电影研究领域做出更多的耕耘和有更多的收获。

钟大丰

2014年1月15日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被誉为“东方巴黎”的都市,曾经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辉煌。“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发动了全面进攻。同年11月上海失守,从此上海进入“孤岛”时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在此期间,大批电影人离开上海,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电影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渐渐开始分化,从而不得不重新组合。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上海的电影产业曾一度陷入窘境,但是,它却奇迹般地以另外一种姿态存活并发展起来。

作为一段历史,1937—1945年间上海电影的发展,是电影史断代研究的特殊课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本土出现了四种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权力集团,即国民政府、共产党、公共租界和日伪。受这四种力量或合作或抵牾的影响,中国电影形成了四大格局:国民政府统治区的抗战电影、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电影、上海租界“中立”区的商业电影和日军占领区的日伪电影。各种形态的电影构成一种彼此独立或相互影响的中国电影版图。

在历史的不断叙述中,对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中国电影的研究,始终坚持了大后方抗战电影为这一时期电影研究的主流。近年,各大格局电影之间的关系被反复提及和论述,开始被学者们重视,但是,对这一时期的上海电影的评价和关注,仍然处于边缘/陪衬地位。对上海电影(1937—1945)的研究乏善可陈,实属缺憾。

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上海电影,如果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必然更为完整和全面。另外,就现存的资料来看,1937年之前的影像资料、文字资料等相对1937年后更为丰富。之所以本书选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研究上海电影的历史节点,是因为战争阻隔了上海与其他区域文化的联系,也使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减弱,硝烟散尽的上海本土变成一座孤岛。将上海电影的发展重新放回到被战争打断的都市化进程的历史语境中,重现这一特殊时期内的文化生存环境。

序 / I

绪论 / I

序篇 上海“滩”：“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后政商消长

第一章 上海都市的开放性 / 3

第一节 上海的都市化程度 / 3

第二节 上海各租界当局的文化统治 / 9

第二章 市民阶层的构成及现代化动因 / 11

第一节 市民阶层的主要来源：移民 / 11

第二节 各类移民转型为上海市民：多次社会化过程 / 23

第三章 市民文化的特征：消费性与流行性 / 29

第一节 市民意识与市民趣味 / 29

第二节 战时市民文化的背景：政商消长 / 33

第三节 “消费革命” / 34

第四节 流行文化消费实质：自我实现 / 36

第四章 市民生活 / 41

第一节 华洋杂处 / 41

第二节 电影市场 / 45

小结 上海持续都市化进程的可能性 / 52

上篇 “孤岛”：电影中国家意识的转换性表达与消解趋势 (1937—1941年)

第一章 “孤岛”上海：开放性被彻底打破 / 57

第一节 日本租界当局的管理效能 / 57

第二节 “孤岛”中的市民生活 / 62

第二章 电影格局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 68

第一节 张善琨的“影业帝国”计划 / 69

- 第二节 电影产业格局:民族电影产业重建的可能性 / 108
- 第三节 电影院的兴盛:国片的直接繁荣 / 122

第三章 国家意识的转换性表达 / 132

- 第一节 《木兰从军》的策略 / 133
- 第二节 女性的消费成为都市生活的标志 / 139
- 第三节 “孤岛”电影对于大后方的政治意义:政治没有灰色地带 / 145

第四章 适应孤岛文化心态与语境的影片制作 / 147

- 第一节 类型化趋势 / 149
- 第二节 剧本荒暴露的电影工业结构性问题 / 161

小结 国家意识的转换性表达与消解趋势 / 166

下篇 全面沦陷期:电影在政治压抑下积极参与本土意识及其话语表达方式的建构(1941—1945)

第一章 全面沦陷后的上海 / 171

- 第一节 “保持‘国际都市’面貌” / 171
- 第二节 “国际都市”计划破产 / 175

第二章 全面沦陷期的文化干预策略 / 184

- 第一节 规范:日本对占领区的电影侵蚀政策 / 184
- 第三节 怀柔:鉴于对欧美文化敬畏之下的“孤岛”文化干预 / 187

第三章 塑造崇日文化认同的努力:日本电影工业在上海本土化的过程 / 191

- 第一节 政治统治与文化渗透:建立“新上海”的设想与电影发行 / 191
- 第二节 直接合作与暧昧的信任 / 209

第四章 符合占领需要的泛亚洲文化形象的建构 / 215

- 第一节 爱情话语的初现:从《博爱》到《万世流芳》 / 215
- 第二节 政治工具和娱乐明星的抉择:李香兰现象 / 219

第五章 用爱情与忠诚建立都市认同 / 224

- 第一节 “社会片”与“大东亚秩序”的背离 / 224

第二节 爱情话语参与本土意识建构 / 227

第三节 经典文本的本土化的重新改编: 忠诚 / 236

小结 上海电影对都市本土意识的表现 / 239

结语 上海电影参与建构本土都市认同的形成 / 240

附录一 图表 / 242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 247

附录三 影片片目 / 261

遇见“未”知的到“来” / 262

后 记 / 263

序篇

上海“滩”：“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后 政商消长

常常用“城”来形容北京,用“滩”来形容上海。

“城”和“滩”,不仅是北京和上海在地理位置、历史传承,以及城市结构和规模上的差异,也是城市性格和都市认同的不同表征。“上海滩”这几个字不仅让很多人遥想到“许文强”和“冯程程”之间的爱情故事,其中还充满视野上的辽阔感和思维的开放性。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上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着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西迁,上海成为一座主权不属于本土力量的城市。

上海滩的前景黄浦江面上停泊的船只不再是繁忙的货船,而是戒备森严的军舰。开放的城市被日本侵略军的坚船利炮包围。百家争鸣、恬静安逸的乐土,变成了压抑喘息的“孤岛”。

第一章 上海都市的开放性

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主要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在社会经济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因而“市”的发展比较缓慢。所以,兼具“城”与“市”双重功能的“城市”在中国发展的较晚,这和中国封建社会重农轻商不无关系。当城市初具规模后,每个城市中必有一定规模的市场。城市吸引力的大小与城市本身的重要性成正比。

城市产生的基本社会原因还在于军事作用。城墙成为城市的象征,具有防御的基本功能,是空间区域的分割和界线。人们可以在城墙限定的范围内安居乐业,同时,他们拥有共同的城市身份。

第一节 上海的都市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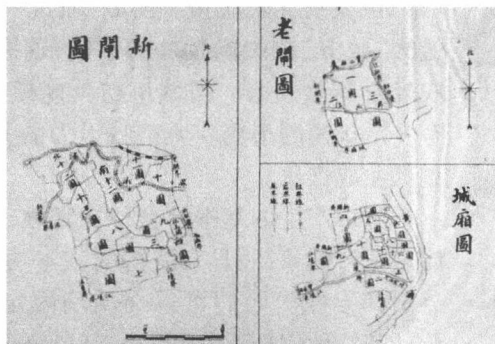
按照中国城市等级制度,县城是可以修建城墙的。但是,上海在设县后的261年中并没有修建城墙。历史上,上海的地理位置从来都不是兵家必争之地,反而是中原人士逃避战乱的隐居之所。明朝以后,江洋大盗和日本倭寇开始在海上作乱,江南的富足引得他们频频“光顾”。所以,上海才不得不修筑城墙。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海建成圆周形的城墙,并不是通常的四方形的城墙。城墙长九里,高二丈四尺,有六座陆门。^①建造城墙时,就地取土,挖了城壕、堆了城墙,一举两得。

从历史沿革看,上海的崛起得益于商品经济的萌芽。当商品经济渐渐势强后,运输能效成为商品流通的决定性因素。相对于陆运而言,水运更加安全、便捷、廉价。此时,上海的地理优势就凸显出来。上海县便利、畅通的江河水脉成为上海商品经济起步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城市性质,上海县的移民传统由来已久。

^① 六座陆门:东门(朝宗门)、南门(跨龙门)、西门(仪凤门)、北门(晏海门)、小东门(宝带门)、小南门(朝阳门)。

——从电影认识上海本土都市认同的形成[1937—1945]
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

19世纪初,上海进入大规模的城市化阶段。商业、工业齐头并进,导致人口的快速膨胀,城墙显然限制了上海作为运输枢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于是,上海县城的城墙在建成300年后,从1860年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拆除城墙的过程。“近代都市的崛起,需要国家有和平的环境来统一国内市场……城墙及相关设施已经成为都市日益发展的赘物。”^①



1871年的上海县地图

开埠之后,各租界当局向清政府索取土地,不断规划、扩张其在上海的势力,使得上海迅速以城隍庙为中心,向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延伸,新的产业模式开始大量聚集在新的区域内。黄浦江、苏州河沿岸不同的产业慢慢形成了不同的功能区域。无论何种产业形态,都离不开黄浦江或苏州河的水域运输功能。

与水域相关联的“滩”成为上海的城市名片。“滩”不仅代表着连接陆地与江、河、海等水域的地理介质,也是连接上海与其他城市的介质。“滩”上没有高高垒砌、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它代表着没有阻隔的空间。“滩”成为上海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城市性质,这是一种开放的存在形式。“滩”的延伸消解了边际和割裂,正如当时的上海以开放的胸怀,海纳百川、迎接八方。

这就是上海“滩”:一座自古以来就鲜有城墙围合的城市,一座因为开埠而迎来高速都市化发展的城市,一座丧失过主权而形成独立品格的都市。

上海是一座非常独特的城市,“在世界城市中,上海个性也相当明显。她与伦敦、巴黎、纽约等城市在贸易功能、娱乐功能、移民人口方面确有相似之处;与加尔各答、孟买等城市在西方影响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又很不一样。她不同于纽约、巴黎,不是由传统的中心城市演变为现代大都市的;她不同于纽

^① 王爱国:《城市和都市区别之四辩》,《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版,第7页。

约、洛杉矶,不是在主权完整情况下形成的移民城市;她不同于加尔各答、孟买、新加坡,不完全是在殖民主义控制下从荒滩上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上海就是上海”。^①

一、经济活力的变化

1937年8月初,日本驻沪海军不断挑衅滋事,接连进犯吴淞、江湾等地。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犹如箭在弦上,不可避免。

“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夕,居住在上海的普通市民不得不面对去还是留的艰难选择。上海的经济活力明显减弱,稳定的市场情绪渐渐稀薄,恐慌、囤积等气氛四处蔓延。

战火燃至上海,必将严重影响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沪租界以及中国当时社会上层的官僚买办资本家们的利益。那么,这座牵系着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城市行将何方?

(一) 物价飞速上涨

物价指数(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相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它是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之一。一般定义超过3%为通货膨胀,超过5%就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通常,CPI涵盖了房屋支出、食品、交通、医疗、成衣、娱乐、其他等几大类商品的物价来决定各种支出的权重。相对而言,权重最高的商品物价的上涨将推动整个CPI的上涨。

物价指数的变化对市场信心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影响,这关乎普通市民的生活成本,也就影响到整体对收入支配中流行文化的消费所占的比例。因此,考查社会动荡的时代,市民消费支出的权重,尤其是流行文化消费所占的比重,将有利于我们考查电影消费的市场环境、价格趋向,上海市民的观影热情和实际的消费能力,以及相对稳定的观影人群。另外,决定CPI指数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问题,即不同收入的社会阶层其消费差异将影响到消费支出的比例。所以,流行文化消费支出稳定,又具有观影习惯的观众群,才是电影生产主要面对的对象。电影创作者必然希望这部分观众获得对影片的情感认同。这可视为是从电影产业的角度上考察电影生产的商业土壤和客观环境。

民国时期上海的物价发展是一个不断波动变化的过程,包括以下两个发展时期:

1. 第一时期:1912—1937年,其总体趋于平稳。1912年到1926年的北

^① 熊月之:《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从电影认识上海本土都市认同的形成1937—1945
——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

洋时期,上海的物价总体相对稳定,有起有落。^① 比起以后的几个时期而言,仍不失为物价最稳定的时期。^② 从1927—1937年的十年间,物价经历了一个“涨—落—涨”的过程,物价指数上涨了50%左右,波动幅度较大。

将时间聚焦到“八一三”事变前的一年时间中,即1936—1937年6月期间,物价指数较之前再现涨势:1936年物价指数为12.6,1937年6月涨至16。两年一共上涨了28.6。如果以1937年6月的物价指数126.1与1935年7月的最低指数90.5相比,则高出39.3。^③ 这个时期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颇为多元:

A. 国民政府为了挽救经济危机,仿效西方于1935年11月4日宣布放弃银本位,实施不兑换的法币制,直接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法币的发行从一开始就是大力度的,仅到1935年12月即从43700万元增至124100万元,与1935年同月发行量相比,增加了85.9%。1937年6月更增至140700万元,与1935年10月的发行量相比增加了3.2倍。^④ “应该说,币制改革这一举措直接刺激了生产与消费,刺激了国民经济的复苏与物价指数的回升。”^⑤ 193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3210.4亿元,比1935年的2983亿元增加了8%,达到抗战前的最高水平。^⑥ 物价也向1931年水平回升,1935年10月上海物价指数为94.1,1937年6月涨至126.1。^⑦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种以通货膨胀贬低币值为手段的方法为日后恶性的通胀埋下了隐患,“实质上就是旧中国通货膨胀的开始”^⑧。这股通胀的压力在不久以后将全面释放出来,直接影响物价上涨速度和涨幅。

B.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扩军备战的刺激,1936年业已出现的经济繁荣景象很快影响到了中国。1937年1—6月,中国进出口贸易比1936年同期进口增加了37%,出口增加了46%,这必然会带动物价的回升。

C. 1936年,农业收成除了川、豫、粤三省自然灾害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

① 据统计,1912—1926年这15年间上涨了33%,其中在1921—1926年间还下跌了4.6%,涨落幅度最高仅达10%。

② 杨蔚:《物价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6页。

③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页。

④ 杨寿标:《中国财政统计大纲》,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40页;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页。

⑤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

⑥ [美]阿瑟·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页。

⑦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13页。

⑧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页。

收成颇丰。棉花产量比1935年增加了44%，小麦增产8.3%。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价值56亿元，比1933—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①1937年农业经济好转，货币供应量增加，老百姓的收入陆续增加。

2. 第二时期：1937—1945年间上海的物价开始暴涨。1945年，比1936年上涨了84,800倍。单以米价计算，即上涨了132,700倍，成为世界上物价涨幅之最。^②这段时期物价上涨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战争造成的供给不足，通胀压力的全面释放等因素都是造成物价不稳定、急速上涨的原因。

1937—1945年间，电影票价并没有随着物价的飞速上涨而同时暴涨，与此同时，物价的暴涨也并没有使得观影人次明显衰减，这些数据必然给上海电影史，尤其是电影产业的发展研究带来新的佐证。

（二）收入水平的差异

20世纪30年代，不同阶层的上海市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差距颇大。

社会上层的买办、官僚、资本家们一般都有着可观的工资、佣金、回扣、红利、股息等多种渠道的收入，所以他们过着非常富足，甚至奢华的生活。据估算，20世纪30年代包括买办、官僚等高收入的人数在十万左右，其生活方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对上海人的影响甚大，有领先与示范的作用。^③即便在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的时期，社会上层的生活质量也并没有降低。

社会中层主要是以普通职员、知识阶层为主的白领阶层。这一人群凭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获得报酬。虽然经历社会转型后，个人因职业、能力、学历、机遇等主、客观因素，际遇相差甚远，但相对总体而言，他们的职业稳定性较强，工资也在逐年递增，生活水平稳中有升。

而普通的工人阶级、手工业者、劳力等阶层，除了微薄的工资性收入外，没有其他的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过着清贫的日子。就上海工人工资而言，1936年比上年增加了10.5%，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后实际收入也是有所增长的。购买力逐年提高，促进了整个工商业迅速发展。1936年、1937年上半年，上海“一般工业大有复兴之象”，“上海各纱厂首受其惠，日夜全班生产”。有些停产多年的工厂也重新开工。^④1936年棉纺业生产比1935年增加了2.9%，水泥增加26.2%，火柴增加18.8%，电力供应增加了8.7%。1937年持续递增，3月份棉纱产量比1936年同期增长了35%，工人工资及就业条

① 董长芝：《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②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页。

③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

④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7年第38期。